

何以文质兼美：文言文经典选篇的内在特质

唐成军，许黄裳

摘要：我国语文教材是文选型教材。文言文作为语文学科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与核心构件，关乎语文学科传统文化教育质量。语文教材要遴选文言经典之作，提升文言文选篇质量。文言文经典选篇典型的内在特质有三个：一是归真，展现真实的生活、历史、情感图景；二是尚善，内蕴崇德弘毅、正心笃志的人格修养，仁爱共济、见义勇为的社会关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等美好品质；三是至美，彰显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具备形式美、内容美与意境美。

关键词：语文教材；文言文；选篇标准

我国语文教材是文选型教材，选文直接关乎语文教材的面貌与质量。文言文是语文学科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与核心构件，将什么样的文言文编入语文教材直接关乎语文学科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目前学界关于文言文选篇标准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是散落或融合在语文教材选篇标准总体论述之中。“文质兼美，适合教学”长期以来是我国语文教材选篇的标准。但何谓“文美”、何谓“质美”？什么样的文章适合教学？诸如此类问题往往或歧见纷纭，或语焉不详。简言之，选篇标准宏观笼统，针对性不强。

“文质兼美，适合教学”，涉及选文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文质兼美”是对选篇本体特征的规限，主要考察选篇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适合教学”则更多是选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如国家政策、教育观念、教师水平、学生基础等，所以“适合教学”往往根据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质兼美”具有相对稳定性，其蕴含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彰显了一个民族普遍

认同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就像家族基因世代相传。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我国现代语文教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与积淀，选入大量文言文篇目。有的文言文选篇能稳居不同时期的语文教材，而有的就只能名噪一时。那些历经百年而不倒的文言文经典选篇究竟具备哪些内在特质？本文将对其展开探析，以期更好把握“文质兼美”特性，提升文言文的教学质量。

一、归真：文言文经典选篇展现真实图景

所谓归真就是文言文经典选篇所写内容反映真实的人生、历史和情感，没有无病呻吟、虚妄杜撰、虚情假意的成分，回归了生活、历史、情感的本真。

其一，生活之真。我国古代诗歌侧重抒发作者情志，讲究“写意”；而文言文经典选篇侧重“写实”，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性，真实反映了古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情状与生活理想。例如，《送东阳马生序》对“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求学生

基金项目：2024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语文教科书中的浙江故事研究”（24NDQN031YB）。

作者简介：唐成军，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宁波 315211）；许黄裳，北京城市学院教育学部讲师（北京 101300）。

活的回忆,《核舟记》对卓绝技艺的描绘,《登泰山记》对泰山自然景观的描摹等,不一而足。它们是对生活、艺术、自然的忠实记录,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生活之真不仅包括忠实记录的“实然”生活,还有憧憬的“应然”生活,虽然是对生活的想象,但同样体现生活之真,因为其写出了生活的理想与本质。也就是说,有些作品有虚构的成分,但是这些虚构的成分不影响生活理想的建构,并无荒诞之感,内里反映生活的真实本质。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它并没有一种怪诞之感,其究竟是真是假,历来众说纷纭,甚至陈寅恪先生还考证出它有大量真实的成分。事实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作者虚构,都不影响作品的“真”,因为“桃花源”里呈现了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应然”状态。这些选篇记载或描绘的不是狭隘的“小我”生活,而是广阔的“大我”生活。就是说,这种生活之真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一个领域、一个群体的生活。

其二,历史之真。这是经典选篇所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规律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一是讲述信而有征的历史事件。史传文学毋庸多言,有些政论文和游记文也记录了重要历史事件,如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二是记载真实生动的历史人物。传状类、书牋类、哀祭类、杂记类文章讲述了不少历史人物的生活故事,有王侯将相,亦有文化名人。三是揭示普遍而客观的历史规律。有的经典选篇不仅记录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能从复杂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历史规律。如《谏逐客书》证明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开明政治主张和用人路线的正确,《过秦论》《阿房宫赋》洞悉不施仁义,荒淫无度,必将丧权亡国的历史规律,这些选篇揭示了进步、科学的历史民本观。而有的选篇不符历史事实,甚至违背历史伦理,如李康的《运命论》,把国家兴衰、君臣遇合委之于运命;欧阳修的《五代史宦者传论》把祸国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显然这些选篇缺乏历史远见,带有明显的封建性、愚昧性,尽管短暂入选过语文教材,但很快遭淘汰。而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具体分析后唐盛衰过程,指出国家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非天命,进而告诫君王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体现出正确的历史观,因而该文迄今仍位列统编语文教材中。经典选篇体现的历史之真与一般历史著作表现的真实有所区别。经典选篇反映历史之真,但并非实录历史,而是有文学的“求真尺度”,对一些不宜明说的现实采取避讳、隐喻或淡化处置策略。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自己与好友滕子京被贬心有不满,只用“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寥寥数语,就肯定了滕子京的才华与能力,为其“谪守”鸣不平,而非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权者,这一方面说明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残酷,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为文的策略与智慧。

其三,情感之真。文言文经典选篇真实但并非照录现实,在真实反映生活、历史的同时,揭示了生活、历史的本质,具有生活、历史的深刻性,同时又重内心世界的真实,追求情感之真。没有情感,作品是冰冷、呆滞的,只有注入真情实感才会灵动、温暖、感人。李密在面对尽忠与尽孝的两难选择时,但凡虚情假意或耍些许滑头,必定引来杀身之祸,李密之所以成功获得先行孝再报君的恩准,就在于《陈情表》“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驾饰”^[1],情真意切,令人动容。《项脊轩志》通过回忆平平常常的家庭琐事,寓人世沧桑之感慨,可谓“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些选篇表达情感不是借助宏大叙事,而是通过真实可感的具体细节,如“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舅夺母志”的早年遭遇,“儿寒乎,欲食乎”的简短寒暄,“凭几学书”的生活场面等,这些人事的叙述或场景的描写,无意于感人,但惨恻欢愉之真情溢于言辞。反观一些干谒文、颂赞文、谀墓文就远不如经典选篇这般真实,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韩愈的《平淮西碑》、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归有光的《上徐阁老书》等文章虽然文采飞扬,曾一度入选过某一阶段的语文教材,但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因为这些作品宏大虚空,无非是或明或暗吹捧对方,使之赏识自己,由于抱着这样的目的,所以不免虚情假意,夸大其词,即便有些真实成分,也不是出于真诚态度与客观立场,而是以文学的方式谋取功名利禄,缺乏厚实真挚的情感。

经典选篇之所以能展现真实图景,是因为作

家的创作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以赤子之心对待现实社会，不欺人、不欺己、不欺世，所以表现自然、社会、心灵的内容就非常诚挚，而那些欺世盗名之作注定是过眼云烟。通过这些经典选文，学生可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生活，增长见识，获取智慧。

二、尚善：文言文经典选篇内蕴美好品质

归真是前提，尚善是旨意。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传统。但“道”义丰厚，“人”生百态，并不是所有的“道”与“人”都能成为经典选篇关注对象与主题。文言文经典选篇所蕴之道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崇德弘毅、正心笃志的人格修养。重视人格教育、人格修养是我国教育的传统，古代教育甚至被称为德性教育，所以反映人格修养的作品其实不少，但能在语文教材中传承下来的是集中体现崇德弘毅、正心笃志人格修养的选文。《苏武传》与《答苏武书》可从正反两面充分说明这一问题。苏武丁年奉使，遭遇扣留、劝说、诱降，滞留匈奴十九载，过着几死朔北之野的悲惨生活，但苏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坚毅忠贞、矢志不渝，最终持节而归。而李陵在《答苏武书》中极力陈述自己“功大罪小”，汉朝负德，写得声泪俱下、情理并茂，艺术修养很高，但从人格修养角度看，苏武是一个典型的正面形象，而李陵因兵败匈奴，受降苟安，个人形象不及苏武高大伟岸，所以李陵的《答苏武书》入选过语文教材，但终究只是“飞火流萤”，而《苏武传》凭着语文教材广为流传。陶渊明素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也有“性本爱丘山”的志趣，惊觉官场黑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决然辞官归田，反映其追求自由独立人格的选文《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自然成为百年经典。其余选篇如《鱼我所欲也》张扬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爱莲说》《陋室铭》等选篇推崇洁身自爱、安贫乐道的高尚品格；《报任安书》《愚公移山》等则颂扬忍辱负重、不畏艰难的自强不息精神。这些选篇中的人物或主旨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君子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

二是仁爱共济、见义勇为的社会关爱。经典选篇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涉及爱自然、爱他人、爱社会多个层面。我国古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创作了不少表现自然、赞美自然、融入自然的经典之作，如柳宗元对永州山水情有独钟，小石潭“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的美景，足以让其“与万化冥合”“犹不欲归”，作者不仅描绘自然、赞美自然，而且融入自然，从中获取精神慰藉。爱家人是爱他人的基础，由内而外，推己及人，所以爱他人的经典选篇集中体现于家庭伦理关系，如弘扬孝老爱亲主题的《陈情表》《项脊轩志》等。爱社会则更多，既有对黑暗社会制度和不良社会风气的揭露与批判，又有表现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义举，如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吴之民”与“五人”面对阉党的卑鄙无耻、倒行逆施，“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还有对美好社会的想象与向往，如陶渊明构想了一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劳作、和谐融洽的理想社会图景。这些经典选篇反映了中华民族讲仁爱、崇正义、尚和合的核心思想理念，为正确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指引，可培育青少年学生尊重自然、心存善念、尊老爱幼、扶危济困的美好品德。而与之不融的选文则无法长留，如杜预的《再上伐吴表》鼓动皇帝伐吴，吴曾祺编的《中学堂用国文教科书》曾选用该文，但此后在语文教材中便销声匿迹。

三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精忠报国、振兴中华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语文教育的鲜明主线，不少体现该主题的文言文入选语文教材。家国情怀既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又有精忠报国的担当勇气。忧国忧民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通过洞察潜在危机，忧思国家之兴衰、黎民之苦乐。封建社会国君就是天下，因此忧国往往表现为忧君。由于强烈的家国责任感，所以当国家软弱无能，屈服于列强时，忧心忡忡，如面对北宋每年向辽、西夏进贡以求苟安，致使国家积贫积弱，每况愈下，苏洵撰《六国论》，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告诫统治阶级汲取六国灭亡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为了捍卫家国荣誉与安全，无数爱国志士忍辱负重，视死如归，

在历史关键节点作出令人赞叹的壮举，如屈原、苏武、荆轲等都是公忠体国典范。这些选文可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意识，以国泰民安为最大光荣，以国破家亡为最大耻辱，增强家国认同感，培育家国情怀，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经典选篇之所以尚善，与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关。选篇作者有一种尚善的创作旨趣，这种旨趣内化于作品，就积聚成理想人格和道德力量。作者把德性修养放在首位，以维护善良美好为使命，用人文精神去观照和表现人生，不仅正视黑暗、不幸、落后，还给人以光明、幸福、力量，引导人们不断战胜丑恶、克服困难，走向光明和美好。

三、至美：文言文经典选篇彰显美学追求

如果说归真、尚善体现经典选篇的“质美”，那么至美则体现经典选篇的“文美”。文言文经典选篇彰显了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我国传统美学追求，具备形式美、内容美、意境美。

第一，形式美。首先，形式美是语言精美。经典选篇的语言简练、干净，没有多余成分。譬如，同样是总结六国破灭的历史教训，苏辙的《六国论》与苏洵的《六国论》比较起来，就要啰唆很多。同样是分析六国与秦的关系，苏洵仅用一句“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便道出六国破灭之缘；而苏辙却用大量篇幅分析六国战略位置，有时甚至无话寻话，一笔化作两笔用，其实战略位置众所周知，无须多言，所以钱基博诟病苏辙的《六国论》，“叠床架屋，无甚意义”^[2]，切中肯綮。经典选篇语言不仅简洁，而且富有音韵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押韵是诗歌中的常见现象，文言文经典选篇也讲究押韵。骈体文押韵自不待言，就是散文也有“骈文性”，多有押韵；还有的运用叠词描绘景物或刻画人物，生成美妙韵律，如《岳阳楼记》运用“浩浩荡荡”“郁郁青青”等叠词描绘洞庭湖的浩渺与生机，口诵心惟，极富韵律美。经典选篇的句式整散结合，错落有致，不少语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其次，形式美还体现于结构精美。经典选篇惯用对比和照应，组成整饬的内容和结构，富有一种对称、齐整的形式美。无论是

叙事、议论、说明，还是抒情，都有对比手法的自觉运用，堪称运用对比艺术的典范。在结构安排上讲究前后呼应，精心布局，如《过秦论》有上、中、下三篇，为何历代语文教材大多只选上篇？就是因为“就结构而言，上篇却最为奇特，最为人们所称道”^[3]，也就是形式最美。

第二，内容美。文言文经典选篇所写内容涉及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人物心理，体现出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经典选篇所写自然有的秀美，有的幽美，有的雄奇美。身居山林深处的小石潭，水石相击，“如鸣佩环”“青树翠蔓”，潭中之鱼“似与游者相乐”。无论是耳闻，还是眼观，无论是静景，还是动景，清秀如画，物我交融。姚鼐描绘泰山冬景变幻多姿，雄奇壮美，雪中泰山“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日出泰山“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远眺泰山“半山居雾若带然”，环视诸峰“绛皓驳色，而皆若偻”，栩栩如生，给人以美的享受。选篇中的自然是美的，选篇呈现的生活也有美好的一面。如项脊轩中的人伦之爱，“桃花源”里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祥和、自由、安谧，充满诗情画意。还有心灵美，经典选篇塑造了诸多道德榜样，如屈原、苏武、范仲淹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所写的故事展现崇高的人格美。内蕴的人格美不是道德理论，而是通过人物故事自然流露。宋濂为勉励同乡晚生马君则勤奋学习，并没有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大肆说教，而是从自身“手自笔录，计日以还”的抄书过往，面对“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的恶劣天气，仍持“弗之怠”的顽强毅力，以及“趋百里外”求师之难的经历娓娓道来，具体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求学生活，现身说法，情真意切，勤奋好学的不屈精神在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再如，《屈原列传》中的屈原在楚王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的情况下，依然心系家国，“忠而被疑，信而被谤”，仍然坚持“众人皆醉我独醒”，不同流合污，不屈从小人，甚至不惜用生命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些选篇蕴含的人格美与作者的经历相融相生，具体鲜活，委婉含蓄。

第三，意境美。我国古人写文章不仅重视内容、文辞，还特别重视文气，韩愈主张“气盛言宜”。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感情要与所写之景、

所述之事、所言之理高度融合，即要有意境。所谓意境就是，“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4]。简言之，如果作品能给人代入感，仿佛置身其中，则文气盛、意境美。意境之于优美诗词不言而喻，之于经典选篇无不如此。文言文经典选篇不仅内容好、文辞美，而且文气盛，情与景、情与理、情与事完美圆融。借景抒情的山水游记文自不待言，即便是借古讽今的赋体文亦概莫能外。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虽写的是历史，但并非实录历史，而是根据《史记》记载想象虚构而成。虽是想象，但并不影响文气，反而营造出独特的意境美。以阿房宫毁灭一段为例。作者写完秦王骄奢淫逸生活，转而以“嗟乎”一词引出喟叹。作者的感叹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由此及彼，“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人情不相远，“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你所想正是大家所想；秦王所念，亦是百姓所需。人心事理比对，拉近距离，引人共鸣。进而质问“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一问就更有代入感了，似乎在与读者对话。然后从六个维度举证，既呼应前文所写宫殿之富丽、生活之荒淫，又为后文写陈胜、吴广起义，项羽焚殿蓄足气势。昔日的富丽辉煌，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流露出惋惜之情，引人深思，意境深远。从这一段来看，叙事、议论、抒情高度融合，但并未给读者铺陈烦琐之感，反而让行文更有人情味、代入感、舒畅感，也就有了意境美。而杜牧的《晚晴赋》，写散步于郊园，见到数十株松树，兴之所起，泼墨描绘，文胜于质，因文害意，给人一种故意“做”文之感，情与事、景、理无法圆融统一，所以遭人诟病，“意不胜，气不振，文采虽美，

渐写渐鄙”^[5]，不无道理。

经典选篇之所以至美，一方面，是由于文言灵活而强大的构词属性，使语言精练而富有意蕴；另一方面，是由于作者面对现实事物有兴发感动的力量，并能借助语言文字完美传达，形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文言文经典选篇体现我国古代文学的典型特色，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美。青少年学习文言文经典选篇，可以积累语言样式，培养民族审美意趣，增强文化认同感，所以刘国正先生多次强调“要重视文言文教学”^[6]。

总而言之，文言文经典选篇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兼具归真、尚善、至美的内在特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资源。语文教材要基于文质兼美的具体内涵选编文言文，充分发掘与利用文言文经典，发挥经典选篇教育价值，助推语文学科传统文化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吴楚材，吴调侯. 精校评注古文观止 [M]. 王文濡，校勘. 北京：中华书局，2018：216.
- [2] 钱基博. 国文教授私议 [J]. 教育杂志，1914（4）：75.
- [3] 吴功正. 古文鉴赏辞典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199.
- [4]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8.
- [5] 徐迟. 文艺和现代化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96.
- [6] 刘国正. 我的语文教育观 [J]. 中国教育科学，2021（1）：6.

（责任编辑：张一鸣）